

# 从民国女子教育反思当代女子性别教育缺失

田汉族, 吕 莘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民国女子教育发展经历了迅速兴起与传统定位、全面西化与独立性缺失、重新定位与政策调整三个阶段,其发展受到教育制度、传统文化、民主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由此反思,当前我国女性性别教育存在女性性别教育缺失、中性化性别教育的误区。要重建女性教育,需要有明确的性别教育目标、设置女性特色课程、营造女性教育的良好环境,民国女子教育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国; 性别教育; 女子教育;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G7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3)06-0023-06

当下的流行文化中,女性中性化现象屡见不鲜,这种风潮在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武十郎》等偶像组合剧中表现明显,甚至在春晚节目中也有演员“中性化”的现象。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社会舆论诸多方面的关注。现象产生背后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当代教育存在女子性别教育缺失的问题。反观民国时期,由于当时时代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阶段,传统与外来文化相互交织,女教也刚刚起步,教育更加注重进行男女两性差异化的教学。笔者认为,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民国女子教育,借鉴其教育制度、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在当代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民国女子教育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

从女子教育发展本身来看,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在整个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践、从观念更新到制度的确立,经历了艰难发展过程。这些观念、制度和办学实践,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各个时期女子教育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发展过程可以归结为三个阶段:

### (一) 迅速兴起与传统定位阶段

20世纪10年代至民国成立初期,女子受教育权得到承认,为女子开设专门的学校与女性课程,注

重贤淑顾家的女性角色的塑造。

中国主流女子教育观从清末维新派提出“贤妻良母主义”以来,虽然随时俱移地被赋予不同的时代意义,但基本上还是始终围绕着妻职与母职进行阐述。清末的大多数普通女学堂都是把培养贤妻良母作为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sup>[1]</sup>。社会主流所认同的优秀女性大都为贞静柔顺、举止文雅、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温婉顾家的女子。

时至民国,虽然女子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在不断更新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但清末以来的“贤妻良母主义”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实际上是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希望女性以现代的知识成为“文化、道德和能力的结合体”<sup>[2]</sup>,可以用以在经济上辅助丈夫并教育孩子,从而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仅与传统女教理论契合,而且迎合了社会心理对“母职”的一种普遍认同。

民国成立后,女子教育渐受重视。民国初年,以壬子癸丑学制为例,其一显著特点便是:女子在这一学制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教育权。设立专门的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在突破封建礼教对女性的限制、体现男女平等观念的同时,也仍保持有对女性独特社会角色的塑造建构,强调男女各有侧重的性别教育。

在该学制内,男女受教育的年限一致,克服了清

收稿日期:2013-03-08

作者简介:田汉族(1964-),男,湖南临澧人,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研究。

末学制中女子小学教育、师范学校教育年限比男子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年限各短一年的不平等规定。女子所受教育程度与清末比也有所提高。在晚清,女子只能接受初等教育,在民国,女子还可以接受中等、高等教育<sup>[2]</sup>。

从壬子癸丑学制关于课程设置的一般原则看,学制强调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程度和特点,注意男女儿童的差别。在课程设置上,“高等小学校补修科之学级,不得合男女生编制之”。女子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则单独成校。小学校女子增加缝纫课,女子中学校缺少三角法,但增加家事、园艺、缝纫等课程。中学校修修身、国文、乐歌、体操等基础课程外,女子中学加家事、园艺(可缺)、缝纫等课。在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也强调了女子师范学校免农业(或商业),加家事、园艺、缝纫课。女子师范学校不仅要附设小学及蒙养园,还要附设小学教员讲习科及保姆讲习科,同样要学习家事、手工、园艺、缝纫等课程。女子职业学校的主要科目为蚕科、刺绣、染织、裁缝、编物、造花等<sup>[3](P78)</sup>。归纳以上课程的特点,不难发现,在民国初年这一时期中,政府开始重视女子教育:课程设置中注重男女儿童教育的差别,专门开设面向女性的学科,强调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当时的教育宗旨紧密相联。再看同一时期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女子大学的教育理念:金陵女子大学董事会成员之一的怀特曾提出,“应该在大学里给予女性职业训练而不是学术课程。在她看来,既然是女子大学,就要设立家政课,它应该成为女子大学里最重要的课程<sup>[3](P80)</sup>。校长德本康夫人也认为,女性并不应当接受与男性同样的大学教育,认为女性教育“应为学生提供特殊的科学教育,应该和家庭相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有实际的用处,能对中国家庭的改善起到极大的作用”<sup>[3](P90)</sup>。此时的外国传教士女教师们也赞同女性的角色定位应为贤良淑德的家庭妇女,具有顾家、温婉的品行。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教育的特征可归结为:女子教育获得承认以及重视,对女子所要具备的社会角色定位明确,教育过程中采取性别差异化的教学。

## (二)全面西化与独立性缺失阶段

20世纪20年代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激进思想的冲击,社会对性别发展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开始提倡一种无性别差别的趋同教育,导致女性性别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这一时期女性身份认同混乱的现象普遍。

在这一时期,最明显的就是课程的变动。如“在

女高师最初的课程中,强调家事作为必修科,随着学校发展,原有的通常被认为最适合女子的课程诸如家政、图画、看护被取消了,以前曾是选修课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成为了学生的必修课<sup>[3](P146)</sup>”。这种在“男女平等”的思想指导下的教育,虽然使妇女得以解放,男女同校,给了女子真正平等的受教育权,但却因为过于强调平等,而使男女学生接受的教育越来越趋同,忽视了教育中应该考虑的性别差异因素。与此同时,和教会女子大学温和地通过社会服务体现爱国主义改良社会所不同的是,以女高师为代表的中国女子高等学府的历史成了一部女性的革命斗争史。女生们跟随社会上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潮,蔑视批判旧的礼教风俗,不断地出现在当时报刊杂志关于抗议和游行示威的报道上,出现在激进分子倡导妇女解放的言论与活动上,出现在与当时北京一些著名大学的男生们组织的各种学会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的文化氛围和激进分子的影响下,女高师的学生也逐渐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产生和同龄男性一样的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意识,形成了新的性别观念<sup>[3]</sup>。新兴女性代表康爱德曾经写过一篇英文小说,对比女性在两种不同性别观念指导下的行为:一种是跨越性别界限,一种则是顺从于性别角色的要求;一种是通过英雄主义甚至是戏剧化的行为方式,一种则是基于女性内在的情感。康观点的正确性就在于明确指出了性别是无法逾越的,它不是由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转换和选择的。换句话说,女性只有用自己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和国家<sup>[3](P78)</sup>。但由于当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鼓吹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西方新的价值观念不断的传入,过于激进的人们没有意识到社会整体的性别认识的稳定性和男女身心固有的差异性,单一从政治层面为了破除封建意识,解放妇女的角度出发,忽略了男女两性之间教育的差异性,于是,导致女子教育的不断缺失。新兴女性顺应这一潮流抛弃了所有传统女性的定位,主张从一切男性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把男女平等单一等同于女性的所有行为可以等同于男性。但可悲的是,随后这些行为并没有使这一批女学生感受到她们所争取奋斗的“平等”给她们带来的快乐和自由,恰恰相反,当激进思想带来的性别观念的转变与社会现实发生激烈冲突时,一大批新兴女性反而感到焦虑和紧张。在这一时期,女性身份认同混乱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女性排斥婚姻,一味极端地追求社会激进思想所提倡的职业与自由,在传统文化与新

兴文化的冲撞下找不到对自身角色的认同,在追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与困境,形成了复杂的性别观念。

归纳来说,在这一时期,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日益趋同,导致大批新型女性社会角色混乱,性别意识模糊。

### (三)重新定位与政策调整阶段

20世纪30年代至国民政府时期,人们开始重新意识到两性差异化教育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在教育指导方针上着重强调母性主义,适时对当时的教育政策进行调整。

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渐淡化,反传统精神和革命热情的消退,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女性们激进地模仿男性的行为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主流意识形态的庇护。随之的还有对女性教育的反思和对新兴女性的争论。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民主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女性,教育对于女性角色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当时社会上对于无差别的女子教育进行强烈的批判,认为正是这种一切男女平等表面上看起来民主的教育使得女子教育培养出了大批在家庭不甘于为妻为母,在社会上又不如男子能干只能做花瓶的女学生。

围绕社会上的批判,国民党展开了新生活运动。意识到女子教育缺失带来弊端的同时,重新将新女性的形象定位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贤妻良母,大力强调母性主义的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女子能建设好家庭和社会生活。1928年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首先提出:“对于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救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教育实施方针是:“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这种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品质、德性做了重新界定和倡导。但要看到的是,此时女性在受到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急剧变迁的冲击、传统性别观念以及新兴性别概念的碰撞后,社会弥漫的一种无意识的身份认同危机,使她们在反抗专制与传统习俗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了正确的性别观念的指导,生活中不断遭遇迷茫与焦虑。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女子教育重新得到定位,强调性别差异化的教学,但仍有一部分人受之前的思潮影响,不断在新旧观念中挣扎。

在民国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中,我

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女子教育经历了一个从重视传统对女性的定位和要求,到全盘否定传统思想走向激进的女子无差别教育观,再到最后批判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回归于传统女子教育理念的一个反复探索的历程。

由于民国中期以男女平等名义追求无差别平等教育的诉求盛行,女性更倾向于社会生活的参与职业生活的独立,盲目排斥了中国传统女子教育中对女子品行和家庭责任的要求、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以至于对传统女学思想的科学性进行全盘否定。结合之后女性对其自身社会角色认同混乱、激进地偏向于放弃本身应当载负的家庭责任的表现,可以看到:那些认为进行两性差异教育会造成男女教育权利不平等,是封建思想对于女性的束缚与压迫体现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而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当下在进行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进行反思的。

## 二、民国时期女子教育发展变化的原因分析

教育与时代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也是这样。从传统到现代再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现了其发展的基本轨迹。影响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传统的文化因素、社会思潮的影响外,教育政策是一个主要因素。

### (一)教育政策的影响

教育在民国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与政治政策息息相关,民国女子教育的兴衰更是与民国的教育强国政策以及女子学校的创办联系紧密。

#### 1. 教育强国政策是民国女子教育兴起的前提。

19世纪之前,接受正规教育一直都是男子的特权,广大的女性一律被排除在学堂之外,没有自由选择是否接受教育的权力。直到19世纪末,维新知识分子在戊戌变法时期意识到了女子的力量,出于强国保种的目的,1898年,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女子学堂在维新派以及进步士绅的努力下诞生。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引入新的教育理念,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否定封建的教育宗旨,在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行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从而为教育领域的男女平等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民国的女子教育从此基本上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前提取决于政府的教育政策,民国颁布一系列法令使男女平等的教育权得以确立,打破了男尊女卑

的封建枷锁,由此真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才得以开始。

2. 教育政策目标的调整直接导致了民国女子教育的地位、内容等的变化。

民国初年,政府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制定了不少促进女子教育的政策。民国成立后,立即对清末学制重加修订,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在这一学制引领下的教育改革使全国各地学校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到了20世纪20年代,《壬戌学制》公布,它对《壬子癸丑学制》的两性双轨差别进行了彻底革除,完全确立了男女平等的教育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实行男女同学,课程上也不再男女之分,将男女教育一致化,趋同化,导致这一时期男女两性教育无差别的窘境。在表面上妇女解放获得巨大成果,男女平等权利得以确立的同时,实质上是性别教育的缺失。

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调整教育政策,重新提倡贤妻良母的教育宗旨,认为女子教育要注意学好家事<sup>[4]</sup>,女子教育的宗旨又重新进行了调整。但尽管“母性主义”教育风行一时,但社会上大致有两派意见,围绕女性究竟应不应该回家展开广泛的讨论,也并非所有学校的教师认同学校的教育目的,国民政府也并没有完全禁止女性走向工作领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政府对于女子教育的影响十分复杂。

由此可见,政府教育政策的调整对女子教育的教育理念与目的产生很大的影响。

### (二) 传统文化的渗透

传统文化对女子教育影响广泛而深远,要研究民国的女子教育,就不得不先了解其时代背景,了解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女子教育发展的深远影响。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传统文化对女子教育的影响不全是积极的。例如,女教中封建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儒家伦理思想,对女子才能与身心发展造成很大的摧毁。但由于本文研究的方向是性别教育,所以对纲常伦理等封建消极思想不做具体的讨论批判,把重点放在探讨传统女学教育中对女子性格塑造部分上,来寻求在当下仍可借鉴的精华。

在清末女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前,中国传统的“女教”实践与理论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礼记》一书中,就有关于“女教”的诸多记载,对少

女、已婚妇女言行都做出具体的规范。作为中国传统女性的礼教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女训,以《女四书》为代表,其作为古代女子的教科书更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被广大女性阅读。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传统女子精英已然认识到女子角色对于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家庭和乐需要女子具有温顺、宽容、仁慈、坚忍的品格,成为人妻之后应善良贤惠、克己谦让,处理好家庭人际关系,这样才不仅利于兴家,更有利于兴国”<sup>[5]</sup>。1907年清政府颁行的《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也明确规定女子教育要注重为母为妇之道:“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女学是以提高女性道德修养、培养男权社会需要的“贤妻良母”、维护传统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为取向的,它在提出了柔顺、贞节是女性道德教育的基本伦理原则的同时,也分析了女性的四行、勤俭、慈幼等行为规范及其实施方法,期待塑造的是一类遵循尊老爱幼、夫妻相敬、勤俭持家等道德要求的女性。这对后来民国女子教育的定位起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

### (三) 民族主义思潮和民主观念的影响

在民国这一特殊时期,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口号深入人心,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动力,女子教育在精英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建构中获得了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民主平等的观念也对这一时期的教育关于女性的思考——如对于自身角色的塑造、在社会中的定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女子教育的定位。

民国时期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当时的女子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女性开始接受教育,使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传统的性别观念,从而走向社会。人们在民族危机面前越来越意识到女性的力量,在民主自由观念的影响下呼吁更多的女性接受和男子平等的教育,完成妇女的解放。

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在民族危难中寻求富强的资产阶级的呼唤下,女子教育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女子教育日益获得与男性教育同等的发展空间,女性的独立意识也不断增强。然而在这一时期,接受女子教育的女性们同时也具备有更强烈的民族责任意识,使她们更多地考虑职业风险而忽略了家庭生活。一些激进的女性甚至拒绝接受女性在家中的角色,同时也拒绝其女性身份,而是积极认同男性气质,希望跨越性别界限,进入男性空间。于是,在遭遇反传统精神的消退,对女性角色的

重新定位时,这一部分女性遭到了极大的身份认同危机。

### 三、当前我国女性性别教育反思

在民国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女子教育经历了一个从重视传统对女性的定位和要求,到全盘否定传统思想,极端地走向激进的女子无差别教育观,再到最后批判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回归于传统女子教育理念的一个反复探索的历程。

(一)无性别差异教育:当代女性教育的严重缺失

社会是由男女两性组成的,因为男女有不同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特征,社会文化赋予其不同的行为模式,才导致人类有了社会性别之分。在教育中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两性的生理、心理、角色定位和社会期待等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差异教育,是教育的应有之义。遵循社会自然规律,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进行正确的性别认同都需要进行有所差异的性别教育<sup>[6]</sup>。民国初期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探索为此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尝试。片面认为民国初期和30年代政府对于教育塑造传统女性形象的行为是进行封建思想灌输、束缚女性的发展、限制其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民国中期以男女平等名义追求无差别平等教育的诉求盛行,女性更倾向于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职业生活的独立,导致一大批人盲目排斥中国传统女子教育中对女子品行和家庭责任的要求、对女性角色的定位,更有甚者对传统女学思想的科学性进行全盘否定。结果出现了女性对其自身社会角色认同混乱、激进地偏向于放弃本身应当载负的家庭责任的现象。可见,那些认为进行两性差异教育会造成男女教育权利不平等,是封建思想对于女性的束缚与压迫体现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而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在进行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进行反思的。今天,在流行的男女平等的理念和学校无差别的课程设置的影响下,许多学校无意识去承担性别教育的责任,这种行为不仅忽视了女性的生理发展要求,同时也忽视了女性的社会性和个性化发展的需求,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缺失。

(二)性别中性化:当下女性教育的误区

反观当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形象已悄然发生改变,人们传统性别观念中那种精致、细腻、清纯、

阴柔的“林妹妹”女性形象正在逐渐的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向阳刚、坚强、主动的中性化形象转变。近年来娱乐界刮起的“中性化”风潮愈演愈烈——2005年,李宇春、周笔畅凭借其中性魅力分获“超级女声”年度冠亚军,这种具有弹性且造型中性化的女孩,使得“中性美”观念在大众中进一步蔓延,并逐渐确立为一种新的前卫风向标,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又一次被颠覆。而背后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正是当下女子性别教育缺失造成的。

当下的教育往往忽视两性间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教育目的方面,要求女生要有像男生一样的能力和素质,如坚韧不拔、刚强、冒险的精神。而传统的温柔、亭亭玉立、善解人意的特质往往就被取而代之。长此以往,可能会颠倒社会角色特征,带来社会问题。“使她们片面理解男女平等论,以为自己和男生一样可以承担相同的社会角色和承担共同的社会责任,使她们在面临社会激烈竞争时往往会感到困惑,无法获得正确的性别角色认同”<sup>[7]</sup>。其次,在教学内容方面,在目前的高校教学计划中,绝大多数学校的各类课程设置有教材编写都缺乏性别视角,教学计划和各科大纲都没有针对性别差异的内容,也没有性别教育的相关课程设置。更缺少性别教育的学科点和培养方向。再次,在教学评价方面,学校对学生的考核评价满足于对男女平等的片面理解,忽视教育主体的性别差异,孤立、片面地看待分数的作用,因而都是以成绩论英雄,极少因性而论。

(三)性别教育:女性教育的重构

回过头来反思当代教育到底应该如何培养合乎时代发展需要的女性,这一命题涉及到女性教育的目的、女性课程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和环境等一系列要素。

首先,要有明确的性别教育目标。男女性别差异是先天不可改变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与个体社会化过程息息相关,而性别角色社会化是贯穿人的一生并受到家庭、学校、同伴以及大众传媒的影响的。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有着特定的性别期待,人们只有满足了社会的性别的期待,尽了社会要求下的女性义务和男性义务,才能真正为社会所接纳。我们不反对性别角色的自我认同,也不完全接受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要求。但女性应该具有与男性不同的性别角色特征,即女性应富有同情心和敏感性,善于理家和哺育子女、对人温柔体贴、举止文雅娴静,即具有“女性气质”。在

现实社会处境下,凡是个人行为与所期望的性别角色一致时,便会受到社会的接纳和赞许;否则,会遭到周围人群的不解和排斥。教育只有培养出更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女性,使当代女性拥有符合社会期待的性别观念来更好地适应社会,享受更好的生活,使男女各司其职,才能使社会更为和谐协调发展。

其次,要在学校设置女性特色课程。参考民国时期针对女性开设的家事、园艺、缝纫等课程,当下教改在课程设置上,也可以有所借鉴。根据女性的身心发展规律,为了适应当下社会对女性的新期待,当今的教改不仅在各类课程和教材编写时增添不同性别视角,而且学校也应开设一些面向女性的课程,例如女性学、女性礼仪、家政学等,以培养合乎社会主流价值观下的新女性。与此同时,辅之以校园文化活动,使其发挥在引导学生根据自身性别特点参与社会活动的作用,使学生对在未来的社会中找到自己位置能做出良好的判断。为此,在学校教育和管理中关注性别议题、培训全面了解并且具备女子性别教育能力的师资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 肖海英.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主流[J]. 社会科学家, 2011(8):41-43.

[2] 李春雨. 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15.

[3] 张素玲. 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 的中国女大学生[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78.

[4]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C].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383.

[5] 王 康. 古代女子的教科书[J]. 人才资源开发, 2011(5):29

最后,要营造女性教育的良好环境。女子性别教育想要在当下教育中得以切实贯彻落实,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女子性别教育政策的落实,是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的前提。当前教育部门应该更为敏锐地把握社会教育现状,对其进行有效的政策制定、教育改革。围绕女子性别教育的问题,要“在国家教育政策中制定适合各年龄的《性别教育法》。明文规定把性别教育融入各年龄各领域的课程纲要、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 建立评价学校性别教育的指数。设立专门的机构监督性别教育的开展,使性别教育在国家的规定下有序进行”<sup>[8]</sup>。这样,才能保证女子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在当下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恰当的性别意识,尊重两性教育自身的差异和规律刻不容缓。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女子性别教育,为社会主流思想所接纳的人才,为社会提供各司其职、各有所长的两性人才是当代教育的新任务。民国对于女子性别教育的优秀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政策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31.

[6] 李 丹. 解读当代女性中性化现象[J]. 法制与社会, 2009(1·下):261-262.

[7] 董晓璐. 大学生性别教育的缺失及对策思考[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6(5):125-127.

[8] 邹 雯, 邹德芳. 高校性别教育的缺失及性别教育策略[J]. 新一代(下半月), 2010(10):79-81.

## Women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inefficiency of gender education

TIAN Han-zu, Lü Shen

(School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Women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goes rapid development, westernization, and manipulation, owing to the educational polic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democracy. It is argued that the present women education should set definit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reate special curricula, and build an ideal atmosphere.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women education; feminism

[责任编辑 霍素君]